人民艺术家老舍 ②

◆ 李伟

“写家”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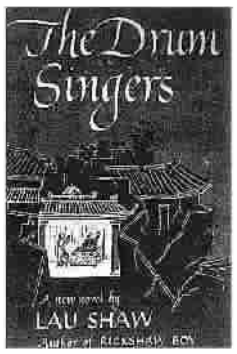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作为满族的旗人也成了和统治者一起被驱逐的对象。老舍在新中国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话剧《茶馆》中也有“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代表了普通旗人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他们爱国，他们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却在清王朝覆灭后承担着某种程度的敌意对待。

辛亥革命断了旗人的生计,京城里大部分满人跌入贫民阶层,一部分当车夫、茶坊、裁缝、木匠、巡警。更可怜的,便是始终没有找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摆茶摊儿,还有一部分沦为妓女。就像话剧《茶馆》中松二爷的叹息:“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在《小型的复活》中老舍这样描述自己:“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安全感。

1949年前,老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满族身份。30年代中期,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给父亲的身份是“在外做生意”,“死在了外乡”;40年代在回忆文章《我的母亲》中依然只是如此简略,“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老舍说他在“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舒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 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初在纽约完成的小说《鼓书艺人》英文版

■ 一九八七年,小说《鼓书艺人》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

老舍19岁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他说自己:“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

1922年,老舍辞去了劝学员职位,不久后,他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常去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作外语学习的捷径。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故乡风物,陈年旧事,就像一幅幅图画涌上心头。他在谈及何以开始写小说时写道:“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1930年，当老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利用暑假写小说。他为上课而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持反对态度。他说:“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好耍呢?”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在理论上回应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他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是抵触的。1950年,他曾真诚地回顾当年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看见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他还说:“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美好,好是好了,怎奈天下没有这么完美的人。”

他说:“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结交出版家。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他说自己因为自幼穷困而“孤高”,便喜欢独自沉思。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认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借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谈到了“独立不倚”对他的影响——“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只不过那时的立场,已经换成了自我批判。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 雄

31.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既然西医治疗难以奏效,那就试中医,用我们那具有几千年悠久传统历史的中医术,来医治这顽症。1972年年初,宋庆龄开始延请中医治疗这顽症，并在当年4月初,“由于吃中药和严格控制饮食，我的荨麻疹正在逐步痊愈。”然而,好景不长,可恶的顽症仍不折不挠地继续冒了出来，在她的身上布满了一个个一元硬币大小的红疱。为此,在1972年6月14日那天,当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皮科专家与另外几位医生在给宋庆龄会诊时，她毅然接受了加拿大皮科专家的治疗:“加拿大的皮科专家给了我一盒药膏，是敷在我发痒的红疱上的。据他说,估计敷上八至九个星期,红疱(有一元硬币那么大)就会消失。”

令人遗憾的是，加拿大皮科专家的特效药,仍没治服宋庆龄身上的荨麻疹。没多久,她身上的红疱又一串串地冒了出来。

外敷不行,内服无效,宋庆龄还是执着认为是体内的毒素在兴风作浪。所以在1972年11月11日乘专机回到上海后，她继续采用西医注射方法治疗荨麻疹,“以排除侵入血管内土霉素余毒”。她怀着很大的希望在信中告诉廖梦醒说:“这里的医生将用一种新方法来治我的病。他们将把某些药物注射到我的血管中去,以排除我体内的毒素。这样的注射,每次约需两个半小时。有时病人会想睡觉,不过经常有护士在守护着我。我指望着这种治疗奏效,因为这是我得以治愈的唯一希望。”

但是，静脉注射法治疗顽症的过程是痛苦的。宋庆龄在当年2月27日写给林达光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去年十一月南下的,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我这里的几位医生商量如何根治发痒的毛病,它经常使我深感痛苦。他们建议用静脉注射……这样能解除我的痛苦,但这是一个激烈的办法,需三个疗程,就是说要用针刺入血管三十次,输送药液。”

宋庆龄被荨麻疹苦苦折磨的事情，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从百忙中

亲自关心此事:“……总理听说我的决定后,立即从北京赶派了两位医生来同这里的医生合作……我的苦难最后总算到头了……我现正在休息，身上那些暗红色的、难看的疱块已开始消失——没有再发过荨麻疹、带状疱疹或风疹！我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到处洋溢着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是神奇！”

1978年1月17日,正是北京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季节,讨厌的风沙助纣为虐,使正准备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并在会议上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的宋庆龄格外忙碌。然而,讨厌的荨麻疹却一点也不识相,依然纠缠着宋庆龄,使她“在北京的干燥空气中尤其令人烦恼，我必须每天在身上涂抹药膏,否则不能止痒”。因为“现在,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今年是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我要做报告,这需要看很多材料,并回忆那些曾发生过但无文字记载的重要事件”。(宋庆龄1978年1月19日致表弟倪吉士信摘)

据《宋庆龄年谱·下册》反映,仅1978年2月中，宋庆龄就抱病连续十多天出席了与主持了重要的国事活动,并在会议上讲话。在出席这些会议时,为制止浑身难忍的瘙痒,宋庆龄始终往全身涂抹着杨孟东赠送给她的一种名为“Lubridema”与“Sandoettee”的英国进口的专用于擦身的药膏,坚持着参加会议。

偏偏在这时,宋庆龄的左眼上还长了一粒“麦粒肿”!这不但使宋庆龄的那只眼睛老是流泪,还妨碍了她的正常工作:“我再次成为荨麻疹的受害者……眼皮上长了一个麦粒肿,所以我不能去妇联参加由邓大姐主持的会议。”

从小一直称宋庆龄为“婆婆”的林国才(其父林介眉为同盟会会员,一直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时,林介眉担任司库,协助廖仲恺先生管理财政事务)曾建议宋庆龄有机会不妨到日本一些有硫磺温泉的地方去治疗，而日本大正制药厂的会长、日本参议员上原正吉夫人上原小技也曾有意邀请婆婆以非官方的身份到日本去疗养一段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安排台湾的宋美龄一起到日本,好让她们姐妹重逢。可惜这个构想一直未能实现。

第一商会

寒川子

17.会不会出啥大事

因天色尚早，毋须赶路,挺举、顺安也就晃晃悠悠地走着,途中又饱餐一顿,抵达贡院街时已是后晌。二人沿贡院街由东而西,边走边看,尤其是顺安,看不尽的稀奇,不住地问这问那。贡院街是条老街,据传是宋代始建,前后历经八百余年,在明代有号舍近五千间。及至清代,号舍更是一增再增,康熙年间竟达一万二千余间,成为江南一带最大的乡试场所之一,规模上仅次于南京的江南贡院。

挺举、顺安走在一道高大的围墙外面。墙内就是号舍,也即生员的做题之处,高约六尺,深约四尺,宽约三尺,一个挨一个,就如鸽子笼相似。号舍之内,左右两壁皆是砖墙,离地面一二尺间各砌出上、下两道砖托,置两层木板,上层为桌案,下层为坐凳,考生白日伏案考试，夜晚困倦时,就把上层木板取下,拼入下层,蜷缩休息。三场大比,七夜九日,老少考生不得出这号舍一步,出去即为放弃。

走到贡院正门时,二人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顺安的目光投在大门两侧的一副楹联上：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

顺安吟咏一遍,问道:“阿哥,这对联吟起来拗口,哪能和这考场不对题哩?”“怎么个不对题了？”“考场对联应该写神仙帮忙、上天助力、才比三江、百家争鸣之类,此地却写风花雪月,岂不是跑题了？”“阿弟有所不知,”挺举应道,“考生数年苦读,在此一举,一进考场,莫不身心紧张,精神恍惚。此副楹联可让考生身心放松,正对题呢。”

“我哪能看不出有啥放松哩,阿哥这来解解。”“考生是八月初九日入场,八月十七日夜出场。阿弟想想看,考生入场后,正值满院桂花生香,身心就会舒畅,才思就会如行云流水,下笔千言就如有神助一般。经过九日苦战,待出场之时,无不身心疲惫,抬头一看,中秋皓月当空,侧耳一听,钱塘江潮声起,顿时物我两忘,疲劳尽去矣。”

“呵呵呵,”顺安憨笑道,“经阿哥这一解,这副楹联真就对题了呢。”指着院门,“八月初九就要进场,今朝八月初五,照规矩此地应该有人打理才是。可你看看,大门里冷冷清清,哪能没见个人影哩？”

经顺安这么一讲,挺举这也意识到什么,情不自禁地“嗯”出一声,扭头四顾:“阿弟所言甚是。前两次随阿爸来,无论提前几日,此地也是人声鼎沸,长衫生员满街游荡。今朝倒是怪哩,满街冷冷清清,不见一个长衫之人。”眉头微锁,“会不会出啥大事体呢？”

“阿哥快看！”顺安猛地指着前面，不无兴奋地叫道。挺举抬眼望去,前面不远处人头攒动,急与顺安跑去，原是一群人正围在贡院的龙虎墙上观看什么。二人挤进去看,上面竟然是一连几张告示，清一色与革党有关，其中排在第一的是缉拿在上海刺杀朝廷命官的革党要犯陈炯,上面赫然描着他的头像,凡密告此犯下落者,赏光洋一百元。

张贴榜单的贡院龙虎墙竟然贴起这玩意儿,挺举一下子蒙了。待回过神来，挺举见身边站着一个戴斗笠的络腮汉子，抱拳问道:“请问先生,这堵墙上,哪能贴起这些来?”络腮汉子瞄他一眼:“你说该贴什么？”“是龙虎墙呀,该贴榜单才是!”络腮汉子上下打量他几眼,给出一笑:“老黄历喽。”“先生？”挺举目光征询。那汉子朝告示努嘴:“你想看的,让这告示压上了！”

挺举盯向那张告示,果见下面压着一张,许是时日久了,已被雨水淋得不成样子。挺举苦笑一声,再次抱拳:“敢问兄台,那上面所写何事？”“上面写的是,自今年起,朝廷取缔科考！”“啊！”挺举目瞪口呆。“那……”顺安急问,“何时开考,上面说没？”“是永远取缔。公告上说,朝廷自今年起,不再经由科举取士。”“经由啥？”络腮汉子耸耸肩,摊开两手。

“你……”顺安白他一眼,“别不是瞎讲吧？介重要的事体,我们哪能一点儿也不晓得哩？再说,这公告……”看一眼那墙,“你凭啥说它写的就是取缔科场哩？”“仁兄若是不信,何不揭开这张看一看呢？”络腮汉子朝告示努下嘴。

这一努不打紧,汉子脸上的络腮胡子竟然掉落一角，虽在一瞬间被他转脸按住,掩饰过去,仍被顺安看个真切。